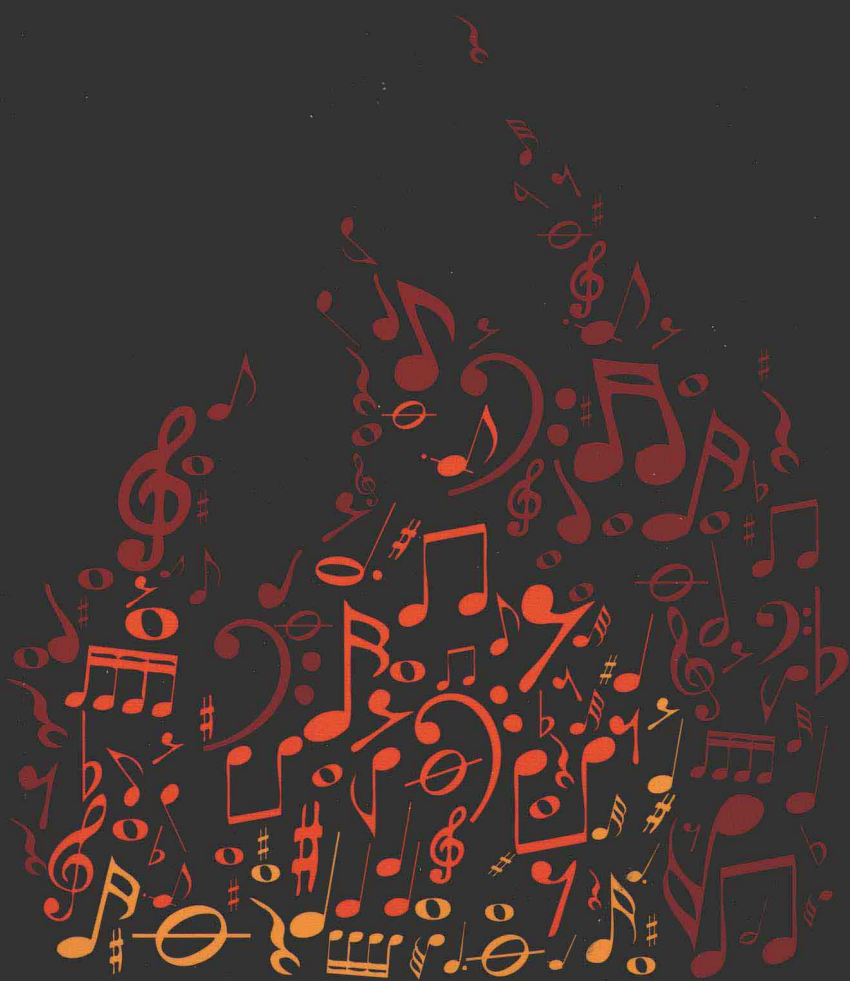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們的歌 是青春的火燄

一個八○後台灣青年的自我批判與反省

張方遠 著



我們的歌 是青春的火燄

一個八○後台灣青年的自我批判與反省

張方遠 著



**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燄
一個八○後台灣青年的自我批判與反省**

張方遠 著

海峽學術出版社 發行人 / 黃溪南

(116) 台北市景興路 193 號 4 樓之 7

電話 (02)8663-2559 傳真 (02)8663-2466

劃撥帳號 19389534 (戶名：海峽學術出版社)

電子信箱 sreview@ms47.hinet.net

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

(100) 台北市師大路 165 號

電話 (02)2367-7878 傳真 (02)2367-7432

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(231)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四維巷 2 弄 2 號 4 樓

電話 (02)2219-2080 傳真 (02) 2219-2180

印刷 輪速印刷有限公司

(235)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568 巷 28 號 1 樓

電話 (02)2226-4796 傳真 (02)2226-5250

封面設計 黃郁維

hyuwei@mc.com

2012 年 6 月初版 定價 350 元

ISBN 978-986-6480-76-8

※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※

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燄

一個八〇後台灣青年的自我批判與反省

張方遠 著

海峽學術出版社

序一

星星之火可以燎原

許介麟

作者張君1985年生於台灣雲林，我是1935年生於台灣新竹市。我們年齡相差50歲，有半個世紀之多。在課堂上，我們切磋琢磨，我的生命還有一點點火焰燃燒，都是靠這些年輕人提供燃料的能源，傳遞不熄的煙火，而不知不覺地燃燒起來。

日據時代，我上台灣人讀書的「國民學校」，學生都赤腳；日本孩子則上「小學校」，穿鞋子上學。日本學生嘲笑我們是「支那人」，甚至謾罵是「ちゃんころ」（清國奴）。每逢節慶的日子，校長一定在台上唸天皇的「教育敕語」，開頭就是「朕維ふに我が皇祖皇宗……」所有老師、學生必須立正恭聽。每天上課之前，我們全體都要起立，背誦「私たちは大日本帝國の臣民として、心から感謝いたします。」（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，從心底感謝。）我們的歌是日本軍歌，如「歡送出征兵士之歌」，開頭就是「天に代りて不義を打つ……」（代天打擊不義）。那時候我年紀還小，但已開始懷疑自己的祖先怎麼是日本的「皇祖皇宗」，日本進攻中國大陸，進軍南洋各國，攻打珍珠港等等，都是「代天行道，攻打不義」嗎？學校教的都是真實的嗎？老師在黑板上寫「鬼畜米英」，美國英國都是魔鬼畜生嗎？我小小的心靈也起了疑竇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戰敗投降，「神國日本」的神話破滅了。最先從大陸傳來的歌是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「起來，不願作奴隸的人們，把我們的血肉，築起我們新的長城……」。然而，

II 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燄

我們的外省籍老師姚錦、黃賢忠等參加讀書會，莫名奇妙地被槍斃，罪名是「叛亂」。我們青春的歌聲，就這樣被壓制下去。

1967年7月15日，在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上，王育德發表著作《台灣——苦悶的歷史》，他積極的敘述台灣經過日本成功的殖民地統治，已經變成「現代化」的社會，台灣人雖然是硬生生地接受「忠君愛國」的日式教育，但已足以分辨世界史上台灣的地位，而刻意割斷台灣與大陸的歷史關係，美化日本的殖民地統治，以正當化台灣獨立的政治信仰。王育德說真理只有一個，而最後獲得勝利的必定是真理。

17世紀法國的數學家、也是哲學家帕斯卡（Blaise Pascal）說過：「被一條河限制的可笑的正義呀！在庇里牛斯山（法國與西班牙邊境的山）的這邊以為是真理的，在另外一邊不過是個謬誤。」（A strange justice that is bounded by a river! Truth on this side of the Pyrenees, error on the other side.——“Pensee” 294）

我真感到慶幸，台灣新一代的歌是青春的火焰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

許介麟

2011年7月20日

（作者係前台大法學院院長、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）

序二

不一般的思索，不一般的見識

吳國禎

我和方遠先生相識的時間很短，才一年有餘，我們不僅不是同世代的，我們也不是同住在「一個」社會的，他在台灣，而我在北京。但是，我對方遠的感覺，猶是「似曾相識」的「忘年交」。

我說，我和方遠不住在同「一個」社會。然而，我對台灣的情況，還是熟悉的。我從小在台灣出生長大，直到大學畢業，當完了兵，才在四十年前赴美國留學。而留學後，我就來到大陸的北京，在科學院和清華大學工作至今。離開台灣那麼多年，我對家鄉的情況難免生疏，只是由於近年兩岸往來的開通，使我能夠「溫故知新」，對台灣才又熟悉起來。然而，不可否認的是，四十年來，台灣的世代輪替，今天台灣的年輕人和我們那個世代的年輕人在生活的環境，思維的方式，關心的議題方面，確實有著很大的不同。這本不足為奇的，因為社會是在演變的，不同的時、空條件，人們自然有著不同的意識。這在大陸，乃至美國，也是一樣的。

如此說法，可能也把一個社會歷史的演變太簡單化了，缺少了對一個社會歷史傳承的分析，缺少了對一個社會歷史脈搏的觀察。我們那一代的青年時期生活在所謂的「威權的時代」，現在的台灣年輕人，可能對之已感陌生。我們那一代的青年時期生活在兩岸對峙，兩岸隔絕的環境中。我們那一代的青年時期生活

IV 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燄

在一切，以美國為首、為標誌的氛圍中。我們那一代的年輕人的心理狀態是：在內（島內）受壓制，在外（美國）也缺少自我的意識。只是，我們那一代青年中，還是有一群能抓住了歷史的機緣，能在留學美國的時期，能大聲對「威權」說不，能對隔絕的兩岸關係說不，也敢於對一切以美國為首的意識形態說不。我們中的一些人敢於起來反對「威權」的統治，一些人敢於衝破阻絕來到大陸，一些人勇於對一切以美國為首的意識，重新做出審思。這一切的一切，真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思想大解放！

四十年後的台灣，沒有了「威權」的統治，沒有了思想的壓制，兩岸關係已經互通有無，並且美國在世界、台灣的影響力，也大幅衰退。這一切，豈不是說，台灣已是一個自由的天地了！然而，我們也冷酷地看到，生活在無拘無束、自由地方的人們，未必然就一定能具有開放的思想，能具有勇於探索周遭世界的胸懷。這二者，不是一回事，不具有必然的聯繫。台灣的社會似乎就是如此的寫照。

然而，這個世界不會是萬事萬物均一致的，每個時代的芸芸眾生中，總有一些不一般的人，勇於說出不一般見識來，勇於做出不一般的事情。四十年前，我們的那個世代有這樣不一般的青年人，今天的台灣，也一樣具有如此不一般胸懷的年輕人，敢於說出不一般見識來，敢於做出不一般的事情。這也就是我說的，方遠先生對我來說是「似曾相識」的原因所在。

方遠先生正將他這些年的所寫出版專輯，我很高興為之寫序，並且就他的所思、所寫表達我的這些發自肺腑的感受和評價。我相信，一個具有不一般見識的年輕人，也一定能在未來，

序二 不一般的思索，不一般的見識／吳國禎 V

做出更不一般的事情，成就更不一般的事業來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reading '吳國禎' (Ng Kwok-chun) in a cursive style.

2011年7月13日寫於北京清華園
(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)

序 三

欣見長江後浪推前浪

王 曉 波

張方遠同學是我平反回台大後，所開通識課程《台灣人與台灣意識》的學生，我的課除了有一次期末考外，還需繳交一份學期報告。我總會把特別優秀的一、二份報告留下來。那學期我發現有一篇研究台獨思想的報告很特別而留了下來，那就是張方遠的報告。

選修我通識課程的學生人數，從八、九十到一百多人不等，台大的自由學風，老師幾乎是從來不點名的，所以，我也無由知道學生的姓名，除非學生主動向老師討教，久了之後才能認識。在學期中，張方遠並沒有特別跟我接近，也沒有留下印象。

後來，在一些活動中，張方遠主動接近我，並告訴我，他選修過我的通識課程，還向《海峽評論》投稿，並主動幫忙參與《海峽評論》的一些編務工作。這時他應該已經從台大政治系畢業，考進了台大政治研究所。記得有一年，他來信給我說，他擔任一家與兩岸有關的媒體實習記者被派往大陸，還採訪了我。

我看他非常熱心和積極投入，所以，邀他列席我們《海峽評論》的編委會，但有一個條件，不能耽誤學校正常的功課，必須學期成績要80分以上。一學期下來，他把成績單給我看，學期成績已超過85分，我才沒有話講。

我是哲學系科班出身，專長領域為先秦哲學和中國哲學史，所授課程也從未超出「哲學」的領域。

《台灣人與台灣意識》應是歷史系開設的課程，內容當為台灣近現代思想史。學術有專攻，對一個哲學系的教授言，開歷史的課程當是「撈過界」了。

為什麼我的學術會「撈過界」，那就得話說從頭了。

日據時代台灣愛國主義傳統，經「皇民化」運動的摧殘，光復後又有「二二八」和「白色恐怖」，殺的殺，關的關。所謂「愛國」只剩下「反共」，但「反共」是內戰，「內戰無英雄」也不都是真正愛國。

1963年，台大學生發生「自覺運動」，含有愛國主義思想，號召青年「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」。愛國自然就會主張國家統一，對抗專制的分裂當局自然就會主張民主。「自覺運動」曇花一現，很快就因「統中會案」（有人祕密成立主張中國統一的組織）和查封其機關刊《新希望》而撲滅。我就是《新希望》的主編。

1972年，台大學生又爆發「保衛釣魚台運動」，保釣是愛國主義運動，思想敏銳的學生又馬上想到，為何戰敗的日本又來侵佔我們釣魚台領土，是由於我們沒有力量，沒有力量是由於中國人不團結而分裂，所以，要保衛釣魚台，中國人必須團結統一。

現在的政府不能保衛釣魚台領土主權，不能促進中國人團結統一，所以，台灣需要民主，要有合乎民意和人民利益的政治。但民主是什麼？有些人認為多數決就是民主，像歐美；有些人認為最大多數的人民是基層民眾，要合乎基層民眾利益的才是民主。

也有人一開始就認為釣魚台本來就不是我們的，為釣魚台和日本不愉快是得不償失，更不能為釣魚台和中共配合；台灣要自由民主，不受中共威脅只有自求多福——台灣獨立，就有國際的

VIII 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燄

保障。

四股思潮——左、右、統、獨——在台大校園裡暗潮洶湧，相互激盪，而有1972年12月4日，在台大森林館舉辦的「民族主義座談會」。

在座談會中，陳鼓應意氣飛揚的大談學生運動；我則提出以三民主義號召中國統一，就不必然，也不必怕中共會併吞台灣。

座談會後，發生軒然大波，獨派學生在校內刊物上圍剿我和陳鼓應，但也受到反台獨派同學的反擊。這場論戰從12月底，一直到學期結束的1月底，將近二個月的時間。當為光復後，台灣校園內第一場統獨論戰。

論戰的對方除了扣我們紅帽子外，竟視八億大陸同胞如寇仇，視任何統一都是中共統戰，並強調台灣當如美國，從英國殖民地獨立出來的。

當時，國民黨「反攻大陸」的口號雖然虛假，但好歹也是統一中國，而不敢言一切統一都是中共統戰。反攻大陸還是為了「解救大陸同胞」，更不敢視大陸同胞如寇仇。但當時獨派陣營同學竟受到國民黨課外活動組的私下鼓勵。

寒假結束前，我從台中返回台北，即聽說盧正邦、錢永祥、黃道琳等學生被捕，最後把陳鼓應和我也抓進了警總，關在警總保安處偵訊室裡，傳來鐵窗外提燈遊行的聲音，才想起當天正是元宵節。是為「台大哲學系事件」。

「哲學系事件」終於把「保釣愛國運動」鎮壓了下去。陳鼓應和我相繼遭台大解聘。陳鼓應被分發到政大國關中心，我只有在世界新專兼課，後才分派到「大陸問題研究中心」任研究員。

在民族主義座談會論戰中，就涉及了省籍、認同和統獨的問題。我父母都是外省人，又不出生在台灣，無論「屬人主義」或

「屬地主義」，我都不是台灣人。我在台大畢業時曾有兩句自勉之辭——「我願終身為真理的僕人，永遠做中國苦難的良心。」我不能為了「媚俗」而曲學。何況，出生是每個人不可侮辱的尊嚴，和不可剝奪的人權，我又如何能自汗自侮？至於認同的問題，要認同台灣當然要先認識台灣，否則豈不是盲目的迷信。為了認同台灣必先認識台灣，我開始研究台灣歷史。

我愈研究台灣歷史就愈認識台灣，就愈認同台灣，就愈認為台獨萬萬不可，也萬萬不能。

龔自珍有言：「欲要亡其國，必先滅其史。」故台灣先賢連雅堂亦言：「國可滅，而史不可滅。」台灣之所以發生民族認同的異化，當來自於「國未亡，而史先滅」。故在政治氣氛稍緩的1987年，我糾合同好組織了「台灣史研究會」。但在「白色恐怖」後，再經李扁20年，台灣認同就更不堪聞問了。

1991年，世界新專升級改制為世界新聞傳播學院，我擔任共同科主任，並開設台灣史為通識課程，我即親自擔任《台灣史》課程。1997年，台大哲學系事件得以平反，我重回台大哲學系，才發現這些年來我發表的台灣史論文竟比中國哲學的要多，但卻不能列入我哲學的學術著作。但我堅持「把台灣人的歷史還給台灣子弟」的心志，而在台大通識課程中開了一門《台灣人與台灣意識》。所以，張方遠才能成為我班上的學生。

我雖非生於台灣，但長於台灣；我雖從小在台遭「白色恐怖」而家破人亡，但身為知識份子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不屋而居」，是台灣人民供養我的，我對台灣人民負有道義責任。

我之所以研究台灣史，發揚台灣愛國主義傳統，除了個人追求認同台灣的心路歷程外，還有三項理由。

一、台灣愛國主義傳統被湮滅，這是對台灣先烈先賢為台灣

奮鬥而犧牲的不公道。「典型在宿昔」，只有能豎立台灣愛國主義傳統的典型，才能樹立台灣人的核心價值，才能恢復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和自我認同。

二、只有恢復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和自我認同，才能和平的完成最後的中國統一，讓「原鄉人的血，只有回到原鄉，才能停止沸騰」（鍾理和語），才能結束台灣人民一百多年來的悲情，也才能為近代中國的悲劇劃下句點。

三、在統一後的中國，台灣人民擁有光榮偉大的愛國主義傳統，必能受到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歡迎。中國的復歸統一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起點，也是台灣人恢復作為中國的主人翁。

張方遠由《台灣人與台灣意識》的課程，而認識台灣，尋找到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和自我認同，愛國愛鄉而思考國家社會的問題。記得，我的第一本文集，也是碩士班研究生時期出版的。張方遠還在念碩士班，現在也要出版他的第一本文集《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燄》，請我作序，情不容辭。歲月無情，我已垂垂老矣，張方遠年紀還輕，前途未可限量，國家前途也出現了希望和光明。我欣見張方遠能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並祝福他能保持「青春的火燄」直到永遠。是為之序。

王曉波

2012年5月29日
（作者係《海峽評論》總編輯）

序四

春天是屬於我們的

陳福裕

收錄在這一本集子的，記錄著一個年輕生命在脈管裡按捺不住的躁動，記錄著一對青春的眼眸對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熱切張望，也記錄著這個浴火重生的古老民族，一代又一代的知識青年注定要在歷史長河中苦苦求索的宿命。主人翁叫「張方遠」，一個從沒忘記自己的來處與身世血源的知識青年，與他結緣，雖說是一個偶然，但總有點心氣相通的必然。他說：「在台灣想做個『中國人』，除非自己對過去台灣史有點認識，而且還要帶點骨氣，否則真是難上加難。」在踏尋台灣人民反帝愛國主義傳統中，他摸清了自己的歷史方位。

2009年3月，一份四開八版、發行量只有5,000份，標榜著「兩岸就學就業專業報」的《兩岸犇報》試刊號，出現在北部各大學校園和文化據點供人自由索取。那是「夏潮聯合會」青年志工們素樸的願望，是他們用了兩個月的義務勞動，以及新台幣9,000元的印刷費所換來的小小成果。青年們的「小打小鬧」意外的在校園裡引起了一場小範圍的騷動，也勾引出泛綠學者和某親綠電視台鋪天而來的攻訐，指控《犇報》「疑似」陸資報紙「入侵校園向台灣學生洗腦」。我能理解這種在政治上遇到重大挫折後的杯弓蛇影，《兩岸犇報》不過是「夏潮」志工們幫他們紮好的稻草人。

在此之前，馬英九在2008年大選中，贏得了58.5%、超過

XII 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燄

765萬票的壓倒性多數，一舉拿下包括高雄市、台南市和嘉義市等綠營傳統票倉在內的所有城鎮地區的過半選票，更有超過六成四的選民「拒領公投票」粉碎了陳水扁「法理台獨」的妄想。當時，人們樂觀地以為，這個結果不但意味著中間選民對貪腐失政的民進黨政府的唾棄，也意味著台灣人民已經超越了兩蔣主政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省籍矛盾、南北差異和城鄉差距，自覺的用他們的選票否定了「福佬沙文主義」的民粹操弄。綠色執政的八年，台灣社會像是出了一場「台獨麻疹」，雖不免滿臉膿包，一旦痊癒，便可終生免疫。

可是，大選後的欣快感並沒能持續多久，從校園裡反饋回來的信息卻讓我們憂心。過去的20年來，一方面是藍綠惡鬥所導致的政治冷漠感；一方面是經濟停滯所帶來的就業困難；再加上後工業社會財富兩極化與收入差距所造成的忿懣，今天的校園普遍瀰漫著一種理想淡化、精神失落，不相信一切的「現代犬儒主義」傾向。他們在思想上找不到也不想找出路的失落，表現為現實上不反抗也不願認同的虛無；他們對一切的主流意識和文化價值保持距離，但卻不敢也不想正面的與之對抗；他們不但懷疑現實，也懷疑改變現實的可能。他們遠離政治，拒絕一切形式的政治參與。

青年是社會的產物，也再生產著這個社會。他們在社會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觀、世界觀，決定著青年朋友的政治選擇、人生追求、道德評價和生活方式，同時也決定了一個社會未來的形態和發展樣貌。青年朋友的這種思想傾向，雖然不再容易成為台獨民粹操弄的對象，但客觀上卻成為維持並延長兩岸分治現狀的力量。在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式微，東亞分工再整編，以及島內產業空洞化的多重架構下，年輕的一代雖承認個人

的發展不可避免的將與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，以及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息息相關，甚至將大陸廣大的市場視為是人生事業發展的主要場域。但在主觀上，兩岸關係長期的對峙，加上李扁執政時期的「去中國化」教育政策，年輕一代普遍存在著嚴重的「認同危機」，即便是對大陸的政治社會體制不帶有誤解和敵意，也刻意保持一定的距離。

淺淺的台灣海峽，原本該是兩岸人民恣意馳騁的場域，百年來卻被人為地阻隔成為一道禁斷兩岸人民交流、交往的「藍色長城」。從今天來看，陳水扁執政對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所帶來的最大傷害，或許不在其任內所推動的「制憲正名」或是「入聯公投」，而是在其延續並落實了李登輝任內所框定的「去中國化」教育政策。前者，在一定時期確實曾為兩岸關係的和平進程投入變數，也帶來不必要的緊張，但是形形色色的「台獨公投」不過是政客們的主觀幻想，註定要成為歷史的泡沫。但是，相對於前者的缺乏現實性，後者卻可以為「和平台獨」埋伏下了一定程度的可能性。「去中國化」教育政策的實施，不但嚴重的混淆了整整一代年輕人的文化認同，也試圖切斷台灣青年民族認同的臍帶。

一百多年來，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既共同承擔了民族積弱的後果，但也各自走上了曲折的現代化進程：中國大陸從乙未割台後，走過了戊戌變法、辛亥革命，最後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基礎上，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，走上今日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」的發展道路；台灣則在日本殖民統治、戰後新殖民主義國際分工的冷戰架構下，完成了國家資本主義積累，最終在後冷戰時期實現了資產階級民主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文化問題上，海峽兩岸各自經歷過不同的歷史淬鍊，從而產生傾向不一的認同危機：上個世紀